

# 红旗



HONGQI

# 17

一九六三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七期 ★

## 目 录

###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

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毛泽东 (2)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5)
-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 (6)
-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 (10)
-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 (12)
-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 (14)
-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 (16)
-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 (18)
-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 (21)



---

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23)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 (25)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 …………… (28)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  
会談上的声明** …………… (30)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結的五項建議** …………… (32)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新“神圣同盟”的結局决不会比旧“神圣同盟”  
更好** ……………本刊評論員 (33)

赫魯曉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  
廢墟”这点上大造謠言? ……………文宜祝 (38)

謹防假冒! ……………杜 敬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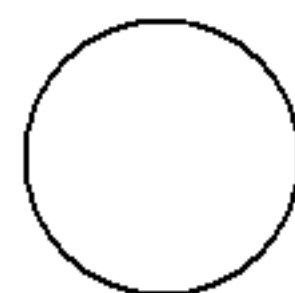
一个腔調 一个步伐 ……………洪 谷 (49)

邏輯与腦子 ……………林銘蕙 (54)

☆ 九 月 六 日 出 版 ☆

---





#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 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 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



吳庭艳政权終將不能逃脫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結局，美帝国主义終將从越南南方滾出去。

吳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經喪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贅，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換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鮮李承晚的下場，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牽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內瓦會議的協議，阻撓越南的統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謂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協議，对老撾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撾重新挑起內战。除了存心欺騙的人們或者十分天真的人們以外，誰也不会相信，一紙条約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規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結、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論在政治上或者軍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們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統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吳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声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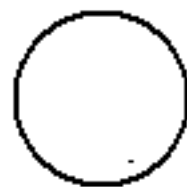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 苏共领导同我們分歧的 由来和发展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經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經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現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談怪論。苏共领导公然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公然撕毀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違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經系統地、全面地論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們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問題。

我們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这篇文章中,曾經概括





地論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們对于有关这个問題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識地作了保留，給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說明真相，弄清是非。現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問題上，扯了許多謊話，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詳細地說明这个問題。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訴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慣用的歪曲事实、顛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責任，轉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說过，“政治上采取誠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态度，是軟弱的表現。”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誠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墮落了的人才靠說謊过活。

事实是最雄辯的。事实是最好的見证人。还是讓我們来看看事实吧！

###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語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現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說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謊。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說，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現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經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統化的过程。人們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的認識，也經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們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許多观点，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謂“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問題，更是极共重大的原則錯誤。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偉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領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錯誤，但是，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勋相比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魯曉夫在總結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經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說。

赫魯曉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說，“在美国主張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問題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們还繼續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說，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經破产，他們中間“出現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說，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壟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維護和平的力量了。

赫魯曉夫宣布，“我們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錯誤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問題”的路綫。

赫魯曉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綫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过渡”的問題，絕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內部事务問題，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問題。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見，就武断地作出結論，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內政，顛复他們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錯誤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見，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說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說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評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弯”，說我們的立場是“搖摆不定”的，是“虛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來說話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經多次在內部会談中，严肃地批評了苏共领导的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澤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員米高揚同志，同苏联駐中国大使的談話，都对斯大林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毛澤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东同志接見苏联駐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还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澤东同志接見苏联駐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談話，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談話，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談話，都一再談到我們对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批評了苏共领导人的錯誤。这些錯誤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談話中，也提出过我們的不同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确地闡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談話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睜着眼睛說瞎話，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澤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講話，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經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們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两篇文章，在駁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謠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論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繼續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偉大的革命領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們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們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进行公开的批評。当时，我們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錯誤。因此，我們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給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則上闡明了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場。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論述了中国革命的經驗，說明了所謂“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詳細論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并且說明了我們党一貫的正确作風，这就在实际上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錯誤。

我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則、坚持团结的态度嗎？

怎么能够說，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貫的、正确的立場，是什么“搖摆不定”的、“虛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轉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們提出这样的指責，大概是他們以为，我們过去的批評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賴賬，可以用謊言来欺騙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們自己是虛伪的嗎！

###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結果”、“偉大的結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記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結果”或是“偉大的結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給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們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們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国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



綫。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會議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討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的障碍。他們自以为他們的內部問題已經解决了，他們自己的地位已經“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們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軍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絕。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毀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絕向中国提供原子彈样品和生产原子彈的技术資料。

接着，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顧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見，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毀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为了討好美帝国主义，創造所謂“戴維营精神”，送給艾森豪威尔的見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魯曉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險主义”，等等。他从戴維营会談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計劃，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訓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經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經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們根据一貫的坚持原則、坚持团結的立場，着重闡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闡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揚的一系列錯誤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們仍然沒有公开批評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論据，来证明他們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們要問：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們应当



对盛行一时的錯誤观点和荒謬言論沉默不言嗎？难道我們沒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嗎？

### 苏共領導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領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腦會議的事件。所謂“戴維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們的論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們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領導把中苏两党之間的意識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開羅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腦會議后的国际局势交換意見。中国共产党不贊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會議，也不贊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我們积极建議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并且主張为了开好这个国际會議，必須作好充分的准备。我們的这个建議得到苏共的贊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會議，参加羅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會議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換意見，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苏共領導竟然背棄自己的約言，把本来應該針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轉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襲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會談，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會談說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騙人的。

事实上，在會談前夕，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別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讀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誣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領導的反华綱領。

在會談中，赫魯曉夫带头組織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規模的圍攻。赫魯曉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誣蔑中国共产党是“瘋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壟断資產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問題上是“純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魯曉夫指揮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傾冒險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魯曉夫在这次会談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許多兄弟党來說，也是一种突然襲击。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錯誤做法的。

在这次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絕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揮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釘。他們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說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嗎？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預謀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則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規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陣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談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談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魯曉夫同志有分歧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絕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揮棒”。“我們党只信服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沒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談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驟，把中苏两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間，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毀了几百个協議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毀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協議，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駐苏使館的一个工作人員，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糾紛。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揮舞手中的指揮棒，糾合一批打手进行圍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經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立場，順从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經考驗和鍛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組織圍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們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錯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們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詳細的論述。在这里，



我們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談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



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



論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的論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論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論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論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針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針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論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論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見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領導同意刪掉他們的錯誤論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見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問題，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問題，我們都是有不同意見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們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問題的文字。但是，我們当时就告訴苏共領導，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們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整个过程，貫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綫的斗争。在这次會議中表現出来的苏共領導的錯誤，較之前一时期已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領導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會議的发言中，已經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領導企图强加給兄弟党的錯誤路綫，在政治上是以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錯誤观点为中心內容，在組織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錯誤政策。这是一条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根本相違反的修正主义路綫。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綫，坚决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路綫。

在这次會議中，斗争的結果是，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會議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則，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會議中，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領導的一系列錯誤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評，迫使苏共領導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許多正确意見，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領導的錯誤一点也批評不得、苏共領導說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說，中共代表团在这次會議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



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要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要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綫，說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上得到贊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說，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嗎？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說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就“得到贊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談这样荒誕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須弄清楚的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綱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貨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違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

这个綱領，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違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許多錯誤观点，又在苏共綱領中出現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說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則，片面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設方針誣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綱領，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錯誤路綫更加系統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綱領，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关于无产階級政党的学說，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階級专政在苏联已經沒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階級先鋒队的性质已經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謬論。

这个綱領，用人道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学說，用资产階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綱領，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綱領，是反对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綱領，是保存和恢复資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詞中就申述了我們党的立場，后来在同赫魯曉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會談中，也坦率地批評了苏共领导的錯誤。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完全拒絕中共代表团的批評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魯曉夫毫不掩飾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們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們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說，“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們有很大的意义”，“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赫魯曉夫的這些話，表明蘇共領導已經下定決心，沿着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國共產黨怎樣多次進行同志式的規勸，他們根本不放在心裡，而且毫無悔悟之意了。

##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

蘇共中央公開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曾經“作了新的努力”，謀求改善中蘇兩黨的關係，謀求加強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

這又是在說謊。

事實究竟是怎樣呢？

事實上，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蘇共領導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政策。這就使中蘇關係越來越惡化，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下面就是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來，蘇共領導破壞中蘇團結，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團結的主要事實：

第一，蘇共領導力圖把自己的錯誤路線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力圖用自己的修正主義綱領代替宣言和聲明。他們把自己的錯誤路線說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近年來的全部列寧主義方針”，把自己的修正主義綱領說成是“我們時代的真正的共產黨宣言”，是“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社會主義友好共同體各國人民”的“共同綱領”。

任何一個兄弟黨，只要它不接受蘇共的錯誤路線和綱領，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蘇共領導就把它當作敵人，就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手段，反對它，攻擊它，損害它，顛覆它的領導。

第二，蘇共領導不顧一切地採取了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中史無前例的行動，斷絕了同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

第三，蘇共領導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惡毒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責我們採取什麼“特殊的立場”，實行什麼與兄弟黨共同方針不同的路線，並且把我們支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也算是一條罪狀。蘇共領導還企圖迫使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放棄自己一貫堅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的路線，接受蘇共領導的錯誤路線，接受他們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準則的既成事實，作為改善中蘇關係的條件。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大肆吹噓這個時期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魯曉夫對中國駐蘇大使講



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



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辯。我們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辯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們仍然留有余地，沒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評。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經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統地交換意見，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誠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們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決議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驅逐中国駐苏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間，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討好美帝国主义者，給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見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条約；苏印間进行頻繁的接触；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瘋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囂尘上。赫魯曉夫领导的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繼續进行中。

### 七年来的事实說明了什么？

我們在上面詳細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



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自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責任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錯誤，勢必遭到他們報復性的打擊，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但是，共產黨人難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因為害怕報復性的打擊就不敢堅持真理嗎？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我們還考慮到，蘇共是列寧締造的黨，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他們進行批評，特別慎重，特別耐心，盡一切可能約束在中蘇兩黨領導人內部會談的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夠通過內部的討論得到解決，而不要公開進行論戰。

但是，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在幾十次內部會談中對蘇共領導的同志式的批評和勸告，都沒有能夠使他們迷途知返。他們在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蘇共領導對我們的好意規勸的報答，是對我們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壓力，是對我們發動越來越粗暴的攻擊。

蘇共領導有一個壞習慣：誰批評他們，就給誰亂扣帽子。

他們說：“你們反蘇！”不對。朋友們，“反蘇”的帽子戴不到我們頭上。我們批評你們的錯誤，正是為了維護偉大的蘇共和偉大的蘇聯，正是為了使蘇共和蘇聯的威信不致被你們糟蹋得不成樣子。老實說，真正反蘇的，敗壞蘇共和蘇聯的，給蘇共和蘇聯抹黑的，是你們而不是我們。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你們就一直不斷地、無數次地干着這樣的壞事。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們給蘇共和蘇聯帶來的耻辱。

他們說：“你們爭領導權！”不對。朋友們，你們這種誹謗實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們的說法，好像有人在同你們爭奪什麼“領導權”。這不是等於大言不慚地宣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存在什麼“領導權”，而這個“領導權”是在你們手中嗎？你們這樣以老子黨自居，是一個很壞很壞的習慣。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明確規定，各國共產黨是獨立的、平等的。根據這個原則，兄弟黨之間根本不應當有領導黨和被領導黨的關係，更不應當有老子黨和兒子黨的關係。我們從來反對任何一個黨指揮其他兄弟黨，也從來沒有想過由自己來指揮其他兄弟黨，根本談不上什麼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現在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不是由這一個黨或那一個黨來領導的問題，而是究竟要聽從修正主義的指揮棒，還是堅持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問題。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正是他們企圖凌駕於兄弟黨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強加給兄弟黨。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聲明規定的兄弟黨獨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國兄弟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

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動和擴大起來的，是由他們強



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 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 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



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





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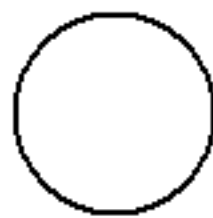
(六)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 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 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 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



我們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談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們党向他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們在此严正地声明，我們党只信服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屈服。我們认为，赫魯曉夫同志在羅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錯誤的，是違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經受到了欢迎。今后我們准备在有机会时繼續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們同赫魯曉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討論。对于赫魯曉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細研究后进行詳細的答复，闡明两党之間的原則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討論。我們相信，無論如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爭辯的，真理最終不能說成是錯誤，錯誤最終也不能說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絕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揮棒。

(二) 我們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維護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維護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們主張，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問題上展开正常的討論，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內，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則問題；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沒有經過事实考驗的、或者經過事实考驗业已证明是錯誤的观点，强迫別人接受。赫魯曉夫同志在这次会談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論赫魯曉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終归是会要繼續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們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們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 我們上面所說的，我們和赫魯曉夫同志之間的分歧意見，从我們两党的整个关系說来，仍屬部分的性质。我們认为，我們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們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們两党都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陣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們相信，我們同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靜气的同志式的商談，解决我們之間的分歧意見，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們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共有利的。

(五) 我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談中提出的《会談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論点的說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問題沒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險——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沒有提到，这是錯誤的，因此，我們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們提出修改草案，建議予以討論。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協議，建議成立一个專門的起草委员会，經過充分的討論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 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 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 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 新“神圣同盟”的結局决不会 比旧“神圣同盟”更好

本刊評論員

馬克思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說过，一切偉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两次。他忘記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現，第二次是作为笑劇出現。”<sup>①</sup>

在欧洲資产階級革命年代里，一八一五年曾經出現过一个“神圣同盟”。一百多年后，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两大潮流猛烈冲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統治的时候，扮演新“神圣同盟”的丑角，又粉墨登場了。

中国有句老話：“殷鑒不远，在夏后之世。”新“神圣同盟”加紧活动的时候，翻翻旧“神圣同盟”的老賬，是大有好处的。

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猛烈地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各国反动派惶恐万状。一八一四年后，在外国刺刀的支持下，被推翻了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王朝紛紛复辟。为了处理打敗法国以后的問題，沙俄、英、普、奥等国，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到一八一五年六月，在維也納开会。这是

一次分贓會議，“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sup>②</sup>但是欧洲局面并没有平靜下来，人民更加不滿，革命在酝酿着。反动派担心法国式的革命在欧洲再度爆发，担心弱小民族起来反抗欧洲列强給他們安排的命运，因此在維也納會議以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勾結。一八一五年九月，“神圣同盟”产生了。

发起“神圣同盟”的“偉大人物”是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国王，以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都加入这个行列。据这些显貴宣布，他們遵循的“金科玉律”就是“仁慈、真理与和平”。这个同盟的“神圣”使命，就是所謂維護“和平”，“平定叛乱”，“保护合法政权”，“促进人类命运的福利”。保障国内外的“和平”，是那些皇帝陛下的口头禪。这就是說，要鎮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維護搖搖欲墜

①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頁。

② 恩格斯：《德國状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1頁。



的封建专制制度；要镇压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维护欧洲列强所需要的秩序。

“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以“扑灭革命之火的消防队长”自居的奥国首相梅特涅，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他说：革命“是一条张牙吞噬社会秩序的九头蛇。”“欧洲人民需要的是和平而非自由。”

总之，不准革命，这就是“神圣同盟”的“神圣”目标。因此，秉承上帝旨意的“神圣同盟”，在一八二一年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一八二三年镇压了西班牙的革命。恩格斯写道：“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sup>①</sup>

可是，“神圣同盟”的好日子并不长。以“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联系起来的那些首脑，一开始就各怀鬼胎，勾心斗角。一八二三年后，“神圣同盟”就明显地走下坡路了。在镇压了西班牙本国的革命后，“神圣同盟”曾经企图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曾经企图干涉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运动。但是由于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阴谋都没有实现。一八二九年，希腊获得了独立。对于“神圣同盟”更大的打击来自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这次革命又一次推翻了波旁王朝。在它的影响下，一八三〇年八月，比利时爆发了革命，脱离荷兰，成为独立国。一八三〇

到一八三一年间，俄属波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邦国，都爆发了起义。“神圣同盟”再也无力阻挠革命的发展了，它实际上已经瓦解。到一八四八年，显赫一时的“伟人”梅特涅也被革命群众赶跑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曾经像“神圣同盟”一样，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的武装干涉，随后又成立了反苏的罗加诺公约。但是，所有这些罪恶的活动和阴谋，都可耻地破产了。由罗加诺公约扶植起来的德帝国主义，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粉碎了。执行列宁主义方针政策的斯大林的领导，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革命是不可抗御的。虽然革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挫折，最后的胜利是必定要到来的。反革命势力在灭亡以前总要勾结起来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猖獗一时，他们失败的命运是早就注定了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一系列国家走上了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包括古巴在内的十三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这

<sup>①</sup> 《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0页。



种形势，远远超过了十九世纪初叶的欧洲。那时的革命，动摇的只是欧洲的封建秩序；当代的革命，却是一场震撼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巨大风暴。因此，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早就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组成了一个新的“神圣同盟”。

很清楚，十九世纪初叶的“神圣同盟”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是当时欧洲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反苏十字军，是二十世纪初叶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新“神圣同盟”，则是当代伟大革命潮流的反动，是当代世界反对革命势力的大联合。

按照当代“神圣同盟”的首脑们的说法，这个同盟的使命像旧“神圣同盟”一样，当然是极其“神圣”而“崇高”的。他们的说法，就是：

保障世界的“安宁和秩序”，谋求“正义的和真正的和平”；

“纠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混乱”，“帮助他们建设新的自由堡垒”；

解放“被奴役国家”，促进“人的制度的逐步演变”；

如此等等。

把这类“神圣”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能够听懂的话，那就是：扼杀被压迫人民的革命

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维护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统治秩序，并且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新“神圣同盟”的首脑同他们的先辈梅特涅一样，认为，世界上一出现革命的火星，就应该执行“维护秩序与和平”的“崇高使命”，予以镇压。如所周知，美帝国主义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镇压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政府的代表曾经投票赞成联合国这个臭名远扬的决议。在这个罪恶的勾当中，印度反动派和铁托修正主义集团起了可耻的帮凶作用。

在这个“神圣同盟”看来，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是十恶不赦的“幽灵”，因为他们居然始终和全世界的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居然敢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如此不识时务地妨碍新“神圣同盟”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于是一个大规模地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华运动被组织起来了。肯尼迪、尼赫鲁、铁托之流，在精心编排的反华大合唱中，采取捏造、欺骗、诽谤、咒骂等等历来反动派惯用的老手法，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共处”，“侵略成性”，“低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质”，“用战争输出革命”，等等。人们还看到，赫鲁晓夫等人也多次地参加了这种可耻的反华大合唱。



在破坏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勾当中，新“神圣同盟”的首脑们一贯努力于使他们之间的勾结更加紧密，并且极力招纳新的伙伴。在这方面，最近事情有了新的发展。

今年六月十日，肯尼迪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有共同的深刻的利益”。他表示希望“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关于这个演说，美国报纸作了些注释。《明星晚报》这样说：有朝一日，美国可能同赫鲁晓夫等人结成“联盟”，“组成反对‘北京危险’的共同战线”。

为了促进中苏决裂，促进反华“共同战线”的正式建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有必要给予赫鲁晓夫等人以某种“帮助”。美国《新闻周刊》说：“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共产党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法新社的一个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美帝国主义所表示的殷切期望和亲善态度，使赫鲁晓夫受宠若惊，他赶紧发表谈话说：肯尼迪的演说“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我们满意地接受改善苏美关系的呼吁”，他们和美帝国主义者“在维护和平上有共同利益。”

但是，肯尼迪并不满足，他还需要赫鲁晓夫作进一步的表示。七月六日，路透社的消

息中说，肯尼迪透露：“对赫鲁晓夫意图的严峻考验，在于他们如何贯彻实现他的禁止试验的建议以及他在目前的莫斯科会谈中，如何处理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争执。”

这个“严峻考验”的结果，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

当中苏两党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了。这封信，表明了赫鲁晓夫“如何处理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争执”。在这封信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用来诽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陈词滥调，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无一不备。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第二天开始的美英苏三国会谈，已经“圆满”结束。危害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了。一年以前，赫鲁晓夫等人曾经拒绝过的可耻交易，现在做成了。

经过这次“严峻考验”，苏共领导人终于违反苏联人民的意志，完全公开地把自己置身于新“神圣同盟”的行列。

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一些国家的报刊评论说，赫鲁晓夫等人参加了“反华十字军”，他们和美国已经组成了反华的统一战线。印度报纸说：赫鲁晓夫和美国“由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印度抵制中国，已经成了共同事业的伙伴。”“这种联盟将不是以正式的盟约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日本《经济学人》说：苏美英三国代表签



署这个条约是赫鲁晓夫“跟着美国肯尼迪总统跑的那种接近美国的倾向”，这种反对中国、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美苏神圣同盟”，将“迫使全世界服从美苏两大国的利益”。这是值得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深思的。

需要知道，几年来，赫鲁晓夫一直是新“神圣同盟”的鼓动家和拉线人。现在，赫鲁晓夫非常兴高采烈。他认为，过去寤寐以求的同美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全面合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从华盛顿到莫斯科的“热线”已经建立，双方正在酝酿新的交易。赫鲁晓夫在援助印度反动派方面，也越来越卖力了，因此，最近印度报纸欢呼说，印苏关系“正在打开新的更为光明的合作的一章”。赫鲁晓夫和叛徒铁托之间，更是异乎寻常的亲密，他们不但拥抱接吻，而且赫鲁晓夫竭力赞扬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表示要“认真学习”它的“经验”。一不作，二不休，赫鲁晓夫既然在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背叛了世界人民，置身于新“神圣同盟”之中，他和肯尼迪、尼赫鲁、铁托的勾结当然会越来越紧密，甘心情愿地做肯尼迪、尼赫鲁、铁托的帮办。他们将要干出一些什么卑鄙齷齪的勾当，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要严密注视的。

当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纽约先驱论坛报》就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政策的含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国际关

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三国条约签订以后，有人以为，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大概来到了。

一些自命不凡的历史小人物总以为自己作的是划时代的大事，总想扭转历史的方向。但是，时代也总是把那些倒行逆施的“人物”毫不留情地倒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

十九世纪初期的“神圣同盟”的出现，曾经被认为是“划时代”的大事。它开始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可是，曾几何时，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革命，反对人民，这个“神圣同盟”在革命运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帝王将相的宝座一个一个地被人民掀翻了。二十世纪初叶组成的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联人民的反动联盟，也早已烟消云散了。当代的“神圣同盟”的首脑们好像并没有从他们先人的悲剧里学到一点什么。他们居然重走一百多年前或者四十多年前的老路，勾结起来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妄想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妄想孤立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当代伟大的革命潮流，不是几个扮演笑剧丑角的“明智”人物所能阻挡的。人民不会饶恕那些做尽坏事的人。这些人得意忘形未免早了一点。旧“神圣同盟”复灭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完全可以断定，新“神圣同盟”的结局决不会比旧“神圣同盟”的结局更好。





#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帝国主义死亡的 废墟”这点上大造谣言？

· 文 宜 祝 ·

在最近，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和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组成的反华大合唱中，有一个唱得特别响亮的调子，就是捏造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说，中国是“好战的”，是“主张通过战争输出革命的”。

印度反动派的头子尼赫鲁说，中国“是侵略性的和扩张主义的国家”，中国“变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和危险”。

叛徒铁托说，中国共产党“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卖分子处于同样的地位”。

赫鲁晓夫等人不愿意在反华大合唱中表示落后，把自己的调子唱得更高。在最近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里，苏共领导人从我们所写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不顾前言后语，断章取义地挑出“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一词，蛊惑人心地说，中国领导要“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要“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他们无耻地说中国共产

党人是有“战争癖”的“狂人”。

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中，究竟说了什么呢？

不妨把这段话引述出来。

我们的原文说：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



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这段话是白纸黑字，写得如此清楚明白，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查考研究。只要不是怀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人，都不难正确理解它的原意。可是，到了自称“愿意仔细研究”别人的文件，对解决问题怀有“善意”的人那里，这段话却完全变了样。

我们也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說法引述出来。

他们说：“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一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尸体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他们又说：“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出美好的将来’。”

双方文字俱在，愿意尊重事实的人，可以比较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我们所说的同他们捏造给我们的观点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看，经过赫鲁晓夫等人的引证，我们

原文中的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反对的，这个重要前提被砍掉了；我们原文中的如果帝国主义一旦要发动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毁灭，而绝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这个重要的论点也被砍掉了；而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即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却被他们恶意地篡改成为“数以亿计的尸体的尸体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换言之”。它像魔术师的法棒一样，经过它一点，就把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似乎是中国要发动战争。赫鲁晓夫等人还昧着良心地说，中国“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

真是旷古未闻的捏造，天下少有的奇闻！

请问：在《列宁主义万岁》这段话中，有哪一句话说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主张过要发动世界战争、发动核战争，“在数以亿计的尸体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

难道认为帝国主义“也有脑壳”、“也有脑髓”的赫鲁晓夫等人，竟把世界人民看作是沒有脑壳、沒有脑髓，不会尊重事实、查对文件，不会比较思考、判断是非的木偶吗？

对于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人们当然是不难看穿的。甚至连某些资产阶级报刊记者也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断章取义的“省略”，是“使中国的论据失去思想光彩的企图的一



部分”<sup>\*</sup>；认为苏共中央公开信說中国好战，是抄自铁托的、来源可疑的捏造。<sup>\*\*</sup>

对中国共产党仇恨入骨、一贯玩弄造謠伎倆的铁托集团，也曾对《列宁主义万岁》的这段话进行过恶毒的攻击。卡德尔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第五节中，就这样做过。不过，他还不致明目张胆地把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反对的这个前提砍掉；不敢把如果帝国主义一旦要发动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毁灭，而绝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这个论点砍掉；不敢像现在赫鲁晓夫等人所做的那样，在引文上玩弄如此没出息的玩意儿。赫鲁晓夫等人既不让苏联人民看到《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又断章取义地摘引这些文章，加以歪曲。看来，他们已经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而只好求救于捏造诬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了。在这一点，他们的恶劣手法比起铁托集团来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也许这就是他们同铁托集团“意识形态的分歧”吧！<sup>1</sup>

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棒下，他们的许多追随者也环绕着“废墟”编造出越来越离奇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謠言。调子完全一样，只是唱法不同。如有的说什么中国人要“用原子‘小灯’来纵火烧地球”；说什么“谁也不愿在热核战争中挨烤，来让中国领导人取乐”；有的人还把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废墟，一会儿說成是“原子辐射废墟”，一会儿又說成为“废墟的星球”，一会儿又变为“千百万人的原子坟場”，一会儿又化成“巨大数量的死尸和焦土”，等等。真是五花八門，光

怪陆离。看来他们在编造謠言方面，正在进行着一場熱鬧的竞赛，并且好像还以为自己发挥了什么独创性而洋洋自得，其实这不过是跟在指挥棒屁股后面信口雌黄、含血喷人而已。

就是那个揮舞指挥棒的人，也一点没有什么独创性，关于“废墟”的謠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原是从美帝国主义者那里抄来的。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和八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华兹沃斯就曾断章取义地援引《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废墟的几句话，诬蔑中国“欢迎原子战争”，說中国想以“一場用氢弹来进行的”世界战争，“使共产主义有希望征服世界”。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又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主义万岁》中关于帝国主义死亡废墟的几句话，辱罵中国是“好战的国家”、“残酷无情”、“侵略成性”，中国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巨大和殘暴的威胁”。

现在是一九六三年，距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年还不到两三年，赫鲁晓夫等人却这样不知羞耻地拾起美帝国主义的唾余，毫不避諱地以美国制造的謠言，向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狂吠。在这一片嘈杂的狂吠声中，誰还能分得清哪些是美帝国主义的声音，哪些是赫鲁晓夫等人的声音呢？

\* 英国《卫报》1963年7月15日。

\*\* 西德《明鏡》周刊1963年7月24日。



如果不是一味无理取闹，而稍微有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气味的話，就不应该在“廢墟”这个词上制造混乱，糾纏不休，而应该想一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旧社会制度廢墟的提法，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讓我們在下面做一些引証吧。

恩格斯說：“资产階級破坏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资产階級的社会制度”①。

列宁說：无产階級要“在資本主义廢墟上組織社会主义制度。”②

列宁讲到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建設任务时，又說：“旧东西已經像应该被破坏的那样破坏了，已經像应该变成廢墟那样变成廢墟了。地基已經清理好了，年輕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設共产主义社会。”③

恩格斯和列宁在这里所用的“廢墟”一詞的意义，是十分清楚、不容曲解的。它不过是說明，新社会制度将在旧社会制度倒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有什么錯誤值得非难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說：“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决不会再繼續容忍那个給他們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我們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論点來說明在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廢墟上建立新社会，又同上述論点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赫魯曉夫等人既然口口声声宣称忠实于莫斯

科宣言，为什么要对我们宣傳莫斯科宣言的这个正确論点进行恶毒的攻击？

很可笑的是，尽管赫魯曉夫和他的伙伴大肆誹謗和叫罵我們关于帝国主义制度死亡的廢墟这个說法，但是他們却在苏共綱領上写着：“全力促进在殖民帝国廢墟上所产生的各个国家的主权的巩固。”

赫魯曉夫在苏共綱領的报告中也說过：“民族解放革命給了殖民主义的巴士底獄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殖民主义帝国的廢墟上产生了四十二个主权国家。”

按照赫魯曉夫的邏輯，赫魯曉夫和他的伙伴这里所說的“殖民主义帝国的廢墟”，是不是就是要几亿人死亡？是不是要在殖民地人民的尸体堆上創造出“主权国家”？如果“殖民主义帝国的廢墟”，就是赫魯曉夫平常所說的殖民地人民的死亡，那末，你們要“全力促进”的是什么？要“巩固”的又是什么？

一些被剥夺了理智的人，总是要那么胡言乱語。

赫魯曉夫天天在那里說什么“明智”、“理智”，可是他总是那么不擇手段，牛头不对馬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的人。他的“明智”就是把一切主張革命，要求革命的人，都叫做“狂人”，叫做“瘋子”。要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頁。

② 《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階級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1頁。

③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7頁。



知道，历史上的革命家总是被反动派叫做“狂人”和“疯子”的。

本来，在旧社会制度废墟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这是要由各国人民自己通过革命斗争去取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什么“通过发动世界战争”去推行革命，用发动世界战争的办法，去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只是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制造的诽谤。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口咬定中国要发动世界战争，甚至要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这种离奇的论断，有什么根据呢？难道我们主张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衷心拥护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正义战争，就是要发动世界战争去推行革命吗？就是要“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了割断社会主义国家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联系，镇压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历来就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诬蔑成“颠覆”，诬蔑成社会主义国家要用发动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等人竟然使用帝国主义侵略者、压

迫者的反动滥调，来咒骂中国共产党，这岂不是把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的地位吗？

现在，不断地进行着侵略战争，正在加紧策划世界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热核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备战，严重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安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制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为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一贯进行着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但是，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充分地估计到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可能发动世界大战、发动核战争的危险。

在这里，根本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坚决揭露它，唤醒人民的觉悟，通过斗争制止它；还是散布核恐怖，瓦解人民的斗志，实质上帮助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进行核讹诈呢？如果一旦美帝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硬把核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革命人民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还是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呢？

革命的人民只能采取揭露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同它們坚决斗争的态度，而绝不能采取悲观绝望、屈膝投降的态度。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就是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分析，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正确地指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被毁灭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而绝不会是全人类；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绝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很明显，正是赫鲁晓夫等人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看成就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跟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

很明显，这些“人类毁灭论”者，才真正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对于人类的光明前途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

固然，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也可以发现这样的词句，如说，“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但是，这些话跟他们上面的逻辑，不是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吗？在双方动

用了核武器的情况下，按照赫鲁晓夫等人的观点和逻辑，世界岂不也要变成“人类的废墟”？那么，又有谁来“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呢？

要么是你们思想混乱，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是你们像你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

拙劣的捏造，变成了自我暴露。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蓄意歪曲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在“废墟”问题上挖空心思大作文章，恰好暴露了赫鲁晓夫等人已经堕落到不择手段造谣惑众的地步，妄图欺瞒苏联人民，蒙蔽世界舆论，煽起一浪又一浪的反华高潮；恰好暴露了他们甘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义务宣传员；恰好暴露了他们散布核恐怖，以死亡的威胁来吓唬世界人民，不准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准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以此为肯尼迪的“和平战略”效劳，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由此可见，恰恰是赫鲁晓夫等人所宣扬的观点，倒的确是在“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乌云永远掩盖不了太阳，谎言和捏造也永远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辉。谎言编造得越离奇，只能越暴露编造者自己的丑恶嘴脸。



# 謹防假冒！

杜敬

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能只凭招牌。区分这两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这就是：他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对待各国革命人民的态度是怎样，对待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态度是怎样。

試举几例，以資識別。

“詛咒和警告——即使把它們叫作‘严重警告’并重复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这是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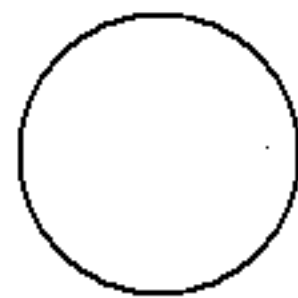
二百五十次，这个数目总算沒有說錯。美帝国主义屢犯中国的神圣領空領海，截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的那一天，中国政府已經提出了二百五十次严重警告。这是有关我們国家主权的大事，这是我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侵略本质的严正揭露。我們必須記下每一笔賬，让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知道美帝国主义的繼續不断的侵略罪行。

且不說美帝国主义对我們的严重警告采取什么态度。奇怪的是，那些口头上說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目标、有着共同敌人的人，而且自称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作了創造性发展的人，对于我們这一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行动，不仅不支持，反而輕蔑地挖苦、嘲笑。大概这就是他們所說的“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場”吧！然而，这究竟是誰的同盟者，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呢？

在苏共领导人看来，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不应当警告，也不要如实揭露，而应当替它粉飾打扮。大概这就是他們的哲学，因为他們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們說，警告对帝国主义者是不起作用的，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失去了对原子-氢武器的壟断，以及苏联建立了強大的軍事能力”。去年，苏共领导人曾經輕率地把火箭运到了古巴，看来是要使自己的軍事能力發揮“重要作用”了。然而，在美帝国主义者发现了古巴領土上的火箭，并以此进行詭詐和威胁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既不是古巴人民，也不是全世界人民，而是那些自称能用火箭保卫古巴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他們在决定运走火箭的时候，还命令自己的船只，服服貼貼地接受了美国的檢查。他們甚至企图牺牲古巴的主权来同帝国主义做交易，要古巴接受什么“国际視察”。



赫鲁晓夫等人的政策就是这样：一会儿是冒险主义，一会儿是投降主义。

在赫鲁晓夫等人看来，没有核武器和导弹，是不能对帝国主义者起“重要作用”的。可是有了核武器和导弹，他们在实际上也还是要听任帝国主义者的摆布。那末，出路何在呢？赫鲁晓夫找到的出路就是投降主义。

他们之所以反对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严重警告，实际上是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看成是可以允许的。有心人不妨看一看，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但是信中根本不提全世界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对于美帝国主义者只是奉承，不敢揭露，甚至尽量避免用“美帝国主义”这个“刺眼”的字眼。不讲主要敌人是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何说起呢？当然，这也难怪。因为，一提“美帝国主义”这个字眼，似乎就得罪了“明智”的朋友，就犯了“圣谕”，就要招来烧身大祸，那还了得！

还有：今年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日本代表为大会起草的关于和平和裁军的报告原稿，因为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苏联妇女委员会主席波波娃等，就对这个报告采取仇视和拒绝的态度，威逼日本代表进行修改。她们说，那么多的“帝国主义”太刺激人了。刺激别的什么人，他们是不在乎的，而刺激帝国主义特别是刺激美帝国主义，那可万万不敢。美帝国主义本来是很“善良”的，刺激得它发了怒，我们可怎么活呀！

另一个代表为世界妇女大会起草的另一个报告中，又控诉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的痛苦，这当然就使波波娃等同样表现出极大的惊慌不安，有人说这个报告简直“是一颗原子弹”。唉呀！你们要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扔原子弹啊！这怎能容许！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sup>①</sup>那些说我们是假革命而以“真革命”自居的人们，却偏偏不敢刺激帝国主义，特别是不敢刺激一点美帝国主义。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说：“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并且指出，必须“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苏共领导人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最忠实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而在自己的文件、讲话和行动中，却不坚持关于主要敌人的论断，不去揭露主要敌人，在一切国际民主组织的活动中，也都不准许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相反地，对于真正忠实于宣言和声明，积极主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人，反而

<sup>①</sup>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页。





說是对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釋”。看来，在某种情况下，发表宣言和声明，他們可以同意，或者被迫同意，也可以在上面签字，但是在实际上，执行不执行，他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了。

在那些人头脑里的美帝国主义，同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头脑里的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样子。因此，我們要警告，要揭露，要反对，他們当然統統不同意，而是要掩飾，要听信，要辯护。

你听：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話是绝对信不得的”。“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們一定要欺騙人的。”①

同样的話，不厌其烦地接連重复了两遍，可謂用心良苦矣！

是啊！切不可忘記，帝国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是同样有脑壳、有脑髓的人呀！我們苏共领导人，而且是一些“最英明”的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者的話是绝对信得的！绝对信得的！为什么你們中国共产党人却偏偏說绝对信不得，绝对信不得？你們坚持这种“特殊立場”，遵循这种“特殊概念”，还能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嗎？你們还“竟敢援引馬克思列宁主义”，你們算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責难，据說并非空口无凭，而是有事实为证的：“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諾言——沒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②

不幸的是，尊敬的肯尼迪总统却偏偏不

賞臉。不要說并未“仍在履行”什么諾言，而且根本就不承认曾經承担了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义务。妄图除掉革命的古巴，这是包括在美帝国主义不可动搖的国策之內的。顛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健忘的人，讲稍远一点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就是在最近，肯尼迪还說：美国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示，不接受在加勒比海地区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并且“不能在和平的意义上同它共处”，“我希望局势有一天将会改变”。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唯恐有人忘記，隔了一天又把总统的話重复了一遍。

言犹在耳，这将作何解釋？

不要着急，那些說帝国主义者的話绝对信得、绝对信得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有道理的。他們会說：美帝国主义者的和平諾言是绝对信得的！绝对信得的！而其战争和侵略的叫囂，却是绝对信不得的！绝对信不得的！

掩飾，辯护，強要別人听信，犹恐不足，进而煞費苦心地为美帝国主义做画皮，千方百计地要把美帝国主义打扮得儼然像“救世主”。远在天涯，則对空遙拜，一朝得見，則笑臉相迎，热烈拥抱。甚至不惜用一些令人肉麻的語言和举动，要人相信这决不是什么侵略成性的敌人，而是可亲可敬的朋友，是“和平战士”。

同美英签订所謂“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大出卖，大背叛，大投降，已經昭然于世。而他們自己不仅把耻辱拿来自卖自夸，还借此为敌人吹噓。赫魯曉夫說什么：“我要对美国和英国的政府以及受本国政府委托

①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进行谈判的美英代表所作的努力给以应有的评价”。《真理报》说什么：三国条约的签订，证明了“最有远见和思想清醒的政治家”肯尼迪之流，也“不得不考虑现实”。原来，肯尼迪、腊斯克之流竟然做出了像《消息报》所说的“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和平事业”的天大的好事，这还不是“和平战士”？这还不是“救世主”？

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赫鲁晓夫“特别热烈”地欢迎了腊斯克，并得意洋洋地让美国人和苏联人“围桌混合而坐”，说“这既不会对资本家有什么危险，也不会对共产党人有什么危险”。

在签字仪式之后，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招待会。当腊斯克和霍姆同赫鲁晓夫一起进入招待会时，乐队奏起了美国作曲家格希温的曲子《爱神来临》。

这个曲子的歌词是：

“爱神来临，赶走了阴影，  
爱神来临给我带来了最美好的日子，  
你的一瞥使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因为爱神同你一齐来临。”

也是在那天，腊斯克还会见了葛罗米柯。葛罗米柯笑着对腊斯克说，他办公室的窗户是“朝向西方的”。能够住在窗户“朝向西方”的办公室里，真是三生有幸！

这几个小小的插曲，或者可以解释为生活琐事。但是，这些政客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政治的。通过这些小事，他们究竟想告诉人民一些什么呢？他们想把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描绘成什么样子呢？

按照他们的描绘，对那些敌人当然是“詛

咒”不得的。美帝国主义者，肯尼迪，是和平天使啊！是爱之神啊！是救苦救难的大慈悲家呀！他们“给我带来了最美好的日子”，“使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呀！这怎能容许你们这些凡人詛咒呢？实在是罪恶滔天！

只此几例，我们已可以根据如何对待敌人这个标志，看出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庐山真面目了。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是，历史上的一些垃圾，是可以借尸还魂的，旧书是可以翻版的。这是什么东西在借尸还魂？这是哪部名著的翻版？新旧对照，自见分晓。

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卡·列金，访问了美国国会，并向国会发表了祝贺演说。当时，二百多名议员把列金当作美国的“客人”，一一和他握手，议长还特别向他致谢。列金在他的美国旅行记中写道，德国社会主义报刊的一些编辑“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赞成群众罢工的演说。而我认为，在这个国会面前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参加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德国工人要求各民族间的和平，要求通过和平进一步发展文化，使它达到最高的成就”。

列宁是怎样批评列金的呢？他说：“请想一下，这位也算是社会主义者嘲笑什么：他嘲笑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居然会想到必须谈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德国机会主义的‘政府要人’（按指列金）太格格不入了。他们要说不触犯‘资本主义’。他们背弃社会主义的奴僕行为使他们蒙受耻辱，他们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

根据列金旅行记中的这一段插曲，列宁



还指出：“这说明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的手法是‘用温柔的方法杀害’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德国机会主义的手法是用拒绝社会主义来讨好‘温柔’可爱的民主资产阶级。”<sup>①</sup>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的重要分歧，这是一个例子。请赫鲁晓夫等人自己照照这一面镜子吧！你们和列宁的区别在哪里？列宁所批评的，不正是你们这一伙吗！你们在自己的头上冠以列宁的称号，只能看作是对伟大列宁的污辱。

再看，也是二十世纪初，在反对清皇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分裂成为革命派和改良派。改良派的康有为，曾经领导过维新运动，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公开为清皇朝辩护，认为无须革命就能实行“新政”。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等即组织保皇党，同革命派相对立，认为革命就会亡国，因此猛烈地反对革命，攻击革命派，说主张推翻清皇朝是“大怪不可解之事”<sup>②</sup>。这时，他们已经堕落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起着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作用。

革命派的孙中山，则批评许多人为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在他看来，由清皇朝统治者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sup>③</sup>。因此，他在列举

了清皇朝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当中所实行的虐政之后，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革命派同改良派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的重要分歧，这是一个例子。请赫鲁晓夫等人再照照这一面镜子吧！在如何对待敌人的问题上，你们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相貌不是也有些相似吗！

如何对待人民的敌人，历来就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现在仍然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那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不愿意也不敢揭露人民的敌人，极力美化人民的敌人，借以蒙蔽群众。他们自己，由对敌人实行无原则的让步和逢迎，以至变节投降。他们“创造”了什么呢？新创造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的遗产。如果这也值得夸耀，世界上就没有“耻辱”二字了。

历史告诉我们，现实也告诉我们，革命的人民不仅要认识敌人，并且要认识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仅要警惕敌人的欺骗，而且要警惕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欺骗。

莫信招牌，谨防假冒！

- ①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0、251页。
- ② 康有为：《辨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12页。
- ③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页。



# 一个腔调 一个步伐

洪 谷

中国有句古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欧洲也有句谚语：“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

看来，古今中外的道理都一样，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不久前，苏共中央发表的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又为这个普通的道理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

在这篇以谎言代替说理的绝妙“奇文”里，以及在这篇“奇文”公布以后所发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和讲话中，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用蛊惑人心的恶劣手法，随心所欲地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帽子。这些帽子上贴的标签有“破坏和平”、“反对和平共处”、“有战争癖”、“假革命”、“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等，等等，不下数十种之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是，应该坦率地说，这些帽子没有一顶是新鲜货色，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全都是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仓库里搬出来的一批行销不畅的陈货。多少年来，叛徒铁托之流就是用这些胡言乱语来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

的。赫鲁晓夫等人只不过是照样学舌而已。

叛徒铁托集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恨之入骨，搜罗了一切最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我们，这一点也不奇怪。令人惊异的是，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继承者自居的赫鲁晓夫，现在居然也对马克思主义叛徒的滥言发生兴趣，而且还把它们搬弄来作为攻打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武器。虽然铁托集团连半个戈比也没有给赫鲁晓夫等人，但是他们叫骂得丝毫也不比铁托之流逊色，甚至连骂人的腔调也是一个样儿哩！且不说别的，就拿这封公开信同不久前铁托在南共联盟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对比一下吧。

铁托说：中国领导人“显然低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质”，“他们号召为世界革命而团结，而不是号召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团结，而在现阶段，世界革命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和亿万人民的毁灭”。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说：“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主张“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

铁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国际争端“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否定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之間和各国人民之間积极和平共处”，“采取在亚洲和整个国际关系中制造紧张的政策”。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国同志“反对和平共处”，并且提出“針鋒相对的斗争”的口号，“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給主張軍备竞赛的人帮忙”，“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铁托說：中国领导人想“在工人运动中取得霸权和意識形态壟断权”；中国正在“发展起最坏的民族主义”，“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欧洲及发达国家人民相对立”。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国同志“想用最輕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

铁托說：“中国领导人由于对欧洲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争取改善生活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持有吹毛求疵和輕視的态度，正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消极的和挫伤士气的作用。”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沒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硬要人們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的方针。

铁托說，中国领导人散发“各种反对其他党及其领导人、包含教条主义内容、包含各种誹謗和歪曲真相的小册子和材料”，“是进行派系斗争和干涉其他党和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苏共中央公开信也說：“中共同志特别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进行顛复活动”；“他們用許多种語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誣毀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屬自

己的影响和控制”。

够了，难道还需要再一一列举嗎？就从这些材料中，人們已經不难发现，赫魯曉夫等人的腔調同叛徒铁托的腔調是多么“吻合”和“一致”！

不过，这里似乎有必要提醒一下赫魯曉夫和他的伙伴：叛徒铁托咒罵了我們許多年，并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罵倒，就連我們的一根毫毛也沒有伤害得了。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罵得越起勁，他們的叛徒嘴臉也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得越彻底。現在，你們也学着铁托的腔調来咒罵中国共产党，又能够得到些什么呢？难道你們就一点也不担心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嘴臉嗎？你們自己也知道，像叛徒铁托那样的一副嘴臉“是不令人羨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

人們并没有忘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八年七月曾經在德國統一社会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稱說：“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輕信的人，使他們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他还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們的言論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

可是，几年以后，还是这个赫魯曉夫，却把他自己嘴里吐出来的話又吞了进去。他完全背叛了自己原先的立場，竟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称作“兄弟党”，把叛徒铁托之流称作“亲爱的同志”，而且津津有味地学着铁托的腔調大罵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一意地



把叛徒铁托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請看，赫魯曉夫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

說到赫魯曉夫等人的這種急劇轉變，不能不使人想起去年十二月間鐵托的莫斯科之行。當時，正是加勒比海危機發生不久，赫魯曉夫的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行為遭到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致譴責的時候，赫魯曉夫以邀請鐵托到蘇聯“休假”為名，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反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請到莫斯科去“交換意見”。在鐵托逗留蘇聯的十八天中，赫魯曉夫給了这个叛徒以“最親切”和“殷勤”的接待，同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有益的會談”，還讓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讲坛上和其他許多群眾集會上，發表了一系列“熱情而友好的”講話。这个叛徒不但以贊賞的口吻表揚了赫魯曉夫“能在最緊要的關頭大膽行事”，並且向他們指出：只要赫魯曉夫同他們“在一起”，就“能對付在國與國之間的关系上所產生和表現出來的一切問題”。赫魯曉夫“怀着濃厚的興趣”听取了這個叛徒的鼓勵和指导，一再高興地表示，他們在“重要國際問題上的觀點”，同鐵托集團“是吻合的或者是接近的”。

事實表明，赫魯曉夫同鐵托進行的“有益的會談”，的確為他“提供了很多東西”，幫助了他更“勇敢”地去“大膽行事”。

會談還未結束，赫魯曉夫等人就立即掀起了一个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高潮。赫魯曉夫親自出馬大肆攻擊和美帝國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人，是採取“最廉價的鬥爭方法”和“巫師庸醫的做法”；誣蔑中國共產黨“要通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他還大肆宣揚，在所謂“古

巴危機”中，鐵托集團“採取了正確的立場”，而“冒充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教條主義者却採取了挑釁性的立場”。他竟敢公然推翻兩次莫斯科會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的正確結論，叫喊“對於明文記載的論點不能……加以重複和加以片面理解”，說什麼“那些過去和現在都站在教條主義立場上的人代表了主要危險”，說什麼“現在左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性並不比修正主義小”。他還指責，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把他們“革出教門”，是對鐵托集團使用“野獸的法律”，要求給這個叛徒集團“在一切兄弟黨的家庭中占有應有地位”。尤其惡劣的是，他們竟然把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大會作為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場所。例如，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們就曾精心策劃和導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反華丑劇。在这次大會上，他們一面明目張膽地為叛徒鐵托集團翻案，讓這個叛徒集團的代表公開販賣現代修正主義貨色；一面粗暴地攻擊堅持莫斯科宣言和聲明的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甚至當中共代表團團長在致詞中引證和闡述莫斯科聲明對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的時候，用強行制止和叫喊、跺腳、吹口哨等流氓手段進行阻撓。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赫魯曉夫等人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難道還不十分清楚嗎？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

今年五月，正當中蘇兩黨舉行雙邊會談的前夕，鐵托集團又召開了以反華和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中心內容的南共聯盟五中全會。在这次會議上，叛徒鐵托公開叫囂要結



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说什么他们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将站在“反教条主义力量一边”，“最积极地参与澄清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这个叛徒还以长者的口吻警告赫鲁晓夫：不许苏共“牺牲别人”去达成“妥协或者无原则的协议”。南斯拉夫《消息报》甚至狂妄地叫嚣，中苏两党会谈取得成果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等人完全执行了叛徒铁托的这一意旨。他们在会谈前，一面为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辩护，一面公开发表决议和声明，“断然拒绝”讨论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责成他们的代表团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在会谈进行中，他们又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挑起了一次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运动。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还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公开地扩大到国家关系中去。他们的这些行动，无例外地都得到了叛徒铁托集团的赞赏。

目前，反华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赫鲁晓夫按照过去的惯例，又需要同叛徒铁托“交换意见”了。不过，这次不是铁托到莫斯科“休假”，而是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休假”。

据报道，师徒二人见面以后，又是拥抱，又是接吻，亲热得了不得。铁托夸奖了赫鲁晓夫“为了使共处和建设性协商的明智政策占上风”所作的努力，赫鲁晓夫也情不自禁地说“你们这里的太阳比莫斯科的温暖”，表示要同铁托继续他们“在莫斯科开始了的会谈”。

赫鲁晓夫究竟要同铁托商量些什么呢？他当然不会把他们的私房话全部拿出来公诸于世。但是，这些天来，他在许多公开场合的讲话，已经向人们透露出他究竟想干些什么。这就是：

第一，要把铁托集团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使这个叛徒集团能够从内部来进行破坏活动。

第二，要求铁托集团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可靠和忠实的同盟者”，要求铁托集团进一步支持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一步支持他反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活动。

第三，要求铁托集团在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之间加紧进行活动，帮助赫鲁晓夫等人扩大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错误影响。

第四，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的“经验”。赫鲁晓夫竭力赞扬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并要“认真学习”它的“经验”。他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对铁托集团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复辟的幌子——“工人自治”十分感兴趣，说苏联“企业管理形式已经过时……是官僚主义的形式”，而铁托集团骗人的所谓“工人自治”才是一个“进步的现象”，是对苏联“有用的”。他甚至考虑要把铁托集团骗人的所谓“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某种办法写进苏联新宪法草案中去。

从赫鲁晓夫的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词中透露出来的东西，已经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是要充分利利用这次“休假”的机会，进一步加紧同叛徒铁托的勾结，为他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的行为寻求支持，为他效法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蜕



变的“特殊道路”请求教益。这种勾结，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它告诉人们，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苏共领导人为了欺瞒舆论，为了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解，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说什么他们同铁托集团“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这简直是胡扯！既然你们同铁托集团“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在各个方面都是“一致”和“合作”的；而且，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你们的纲领就是按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复制出来的，那么，你们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又在哪里呢？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时间刚刚过去一个半月，赫鲁晓夫在八月二十八日就对一批南斯拉夫和外国记者说，他同铁托“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南斯拉夫和苏联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本学说的基础上。既然“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那还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原则分歧呢？既然铁托集团已经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学说的基础上，那么，莫斯科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断还算不算数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还说什么出现了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立场的接近”，企图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铁托集团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什么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是赫鲁晓夫等人干脆脱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滚到铁托修正主义者那一方去了。这一点，甚至连资产阶级报刊也看得很清楚。美国《芝加

哥太阳时报》就曾毫不掩饰地说，“赫鲁晓夫已向南斯拉夫式的共产主义靠近”，赫鲁晓夫同铁托已成为两个“接吻的堂兄弟”。美联社说得更直截了当：赫鲁晓夫“看来目前满足于跟着南斯拉夫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铁托在普拉作过一次臭名昭著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铁托狂妄地宣称，要使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两年以后，铁托又洋洋得意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两年，苏联也重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我们过去因为它受到很多批评，并被称为修正主义者。”请问赫鲁晓夫，现在你们这样热衷地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接近，这样无休止地去“重复”叛徒铁托集团内政、外交的“实践”，人们难道不是有理由怀疑苏共领导人是要让叛徒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在苏共党内完全“得胜”吗？

由伟大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以它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敬仰。苏联人民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战斗的声音，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在美帝国主义大敌当前的今天，在列宁缔造的党内竟然有人紧紧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同叛徒铁托称兄道弟，而对六亿五千万兄弟的中国人民视若寇仇，不择手段地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赫鲁晓夫等人这样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但是，随后，总是会逐渐明白的。





# 邏輯与腦子

林銘蕙

七月十九日，赫魯曉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說：“从某些人的論調中看出，似乎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有权利对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一場战争，……把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根据这种邏輯，帝国主义国家也会有‘权利’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复辟。”赫魯曉夫在这里捏造了一个莫須有的前提，提出了一个奇妙的邏輯！

事实上，这种邏輯并不新鮮，而是早已有之的。

列宁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曾經提到这样一件事：“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維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

段来推翻政府，政府也就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列宁非常贊賞赫爾岑說卡維林之流是“草木一样的人，軟体动物一样的人”<sup>①</sup>。

对沙皇政府迫害革命党人不感到憤慨，而认为是一种“自卫”手段；对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不感到憤慨，而认为是一种“权利”——这两种邏輯是完全可以“媲美”的。卡維林像“軟体动物”一样，跪倒在沙皇脚下。沙皇喝一声：一切革命党人统统給抓起来。卡維林馬上奉命唯謹地学舌道：这是政府应当采取的“自卫”手段。卡維林的这类邏輯，是为沙皇反动統治辯护的邏輯，也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慣用的邏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采用这类邏輯，作为辯护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武器。

在越南南方，在老撾，在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国，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正在用飞机、大炮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甚至认为草木、禾苗和鳥兽也“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必須用最新式的化学武器把它們消灭掉。肯尼迪和它的走狗叫囂說，这样做是有“权利”的，因为据說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正以战争手段在这些地方推行革命，妨碍了“自由世界”的“安全”。

在美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之类的組織，正在剥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自由，把他們投入監獄，送上断头台。肯尼迪之流叫囂說，这样做是有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頁。



“权利”的，因为据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都是所谓“外国代理人”，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代理人”。

对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正在进行颠覆、渗透活动。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美帝国主义每年都举行所谓“被奴役国家周”，说什么：“由于共产主义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侵略，使波兰、匈牙利、立陶宛、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东德、保加利亚、大陆中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北朝鲜、阿尔巴尼亚、伊台尔—乌拉尔、西藏、哥萨基亚、土耳其斯坦、北越等丧失民族独立。”<sup>①</sup>因此，“作为人类自由堡垒的美国”，有“权利”用政治的经济的以至战争的手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恢复资本主义。

我们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逻辑也早已领教过了。自一八四四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看到这种逻辑的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军队还霸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美国的第七舰队还横塞着我们的台湾海峡。从这支舰队上起飞的飞机，从这支舰队中派出的军舰，时时刻刻地威胁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但是，美帝国主义却念念有词地说，中国人民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就是“企图使用赤裸裸的武力”来“扩大权力”，就是“用武装力量来实现领土野心”，就是实行“武装侵略”，就是“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因此，大美国合众国完全有“权利”从遥遥万里之

外，从远隔重洋的太平洋彼岸，派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之一——第七舰队，来遏阻中国人民“侵略”自己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美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就是这样。它自以为祭起了这套奇妙的逻辑，就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可以把侵略南越、老挝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的罪行，说成是“反侵略”的“义举”；把镇压各国人民革命的罪行，说成是打击“外国代理人”的“严正行动”；把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罪行，说成是“解放被奴役国家”的“崇高行为”；把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说成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牺牲精神”。最近几年来，肯尼迪之流特别起劲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好战”。不久以前，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又再一次使用这套逻辑。他公然说“世界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人发动强使别人接受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动”。至于他自己所实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却是所谓努力“谋求和平”、“永远不会发动战争”的政策。<sup>②</sup>

遗憾的是，全世界人民竟然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智”，竟然完全不相信美帝国主义者的这套奇妙逻辑。美帝国主义分子走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愤怒地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这怎么办呢？

① 见195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被奴役国家周”的决议。

② 见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载1963年《新华月报》第7期。



好了，现在有人来替肯尼迪之流劝说世界人民信服这套奇妙的逻辑了。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他早已吹捧肯尼迪之流是所谓“谋求和平”的“明智”之士。现在，他更进一步地跟着肯尼迪捏造说：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了，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权利”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赫鲁晓夫真不愧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煽动家，肯尼迪应该给以奖赏。

但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这种奇妙逻辑，有一个非常不妙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它的前提都是虚构的，都是彻头彻尾地违反客观事实的。事实胜于雄辩。在美国，在南越，在老撾，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肯尼迪和他的走狗，找到在那里发动战争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找到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没有？完全没有。相反，在南越，在老撾，在过去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革命战士却俘虏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官兵，缴获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式武器。到底是誰对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难道还不清楚吗？现在，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周围，在远离美国五十州的遥远地方，有几百个美国军事基地，驻扎着数十万的美军，带着热核武器的美国飞机和美国潜艇日夜不停地在巡逻。这到底是誰在准备发动对别国的战争，难道还不清楚吗？

或许赫鲁晓夫会争辩说，他并没有说中国已经发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而是

“从某些人的论调中看出”，中国主张用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办法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问：中国共产党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文件中曾经有过这种“论调”？就是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公开信中大肆攻击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来说吧！在这个文集中，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声明：“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难道这种态度还不明确吗？

很明显，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对别国发动战争，而是准不准别国人民进行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逻辑千条万条，总的一条是：革命有理。这就是说，既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人民当然完全有理由去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现代修正主义者不同。他们的逻辑千条万条，总的一条是：不革命有理，反对革命有理。他们公然威吓说：谁敢要求革命，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完全有“权利”用战争去摧毁你们。这种修正主义的逻辑，同肯尼迪之流的逻辑又有什么区别呢？



自命为列宁主义者的赫鲁晓夫和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之流竟有相同的逻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赫鲁晓夫在这次苏匈友好大会上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帝国主义也是人，这些人也具有人的感情，也有脑壳，就是说他们也有脑子。至于他们的脑子工作的方向是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的方向是共产主义，他们帝国主义有自己的方向，这没有什么见怪的”<sup>①</sup>。看来，赫鲁晓夫在这里也没有忘记表白一下自己脑子的“列宁主义方向”。不过，他认为有必要教训人们：这种方向问题，现在已经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地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必须大讲特讲的是，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都是人，都具有人的感情，两者的脑子是有相同之处的。大家知道，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都不是超阶级的，人的思想都是有阶级性的。人的脑子是思想的器官。不同阶级的人的脑子产生不同阶级的思想和逻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肯尼迪之流的脑子是用垄断资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因此，这两种脑子所产生的思想和逻辑是截然不同的。现在，赫鲁晓夫自认自己的脑子和感情，同肯尼迪之流的脑子和感情有相同之处。脑子、感情和思想既然有相同之处，它所产生的逻辑当然会趋向一致。美帝国主义者一再夸奖赫鲁晓夫像一个“能干”的“美国政治家”，这决不是偶然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几句扫兴的话。赫

鲁晓夫的脑子尽管非常“明智”，逻辑尽管十分奥妙，但是，这种“明智”和奥妙，除了可以使自己变成“能干”的“美国政治家”以外，还有什么价值呢？请听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在这块半殖民地的大陆上，饿死、并非由于不治之症而病死或未老先衰而死的人每分钟约有四个，每天有五千五百个，每年有二百万个，每五年有一千万个。……与此同时，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sup>②</sup>反映在拉丁美洲人民脑子里的就是这种血淋淋的景象。反映在亚洲、非洲人民以及其他受剥削受压迫人民脑子里的也是类似的景象。他们迫切地要求革命，要求挣脱帝国主义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是任何人使用任何方法都阻挡不了的。赫鲁晓夫自认自己的脑子和感情同肯尼迪之流有相同之处，别人当然不能说不同。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请教一下：你有什么神妙的方法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脑也同帝国主义的脑子一样地思考问题？难道凭一套奇怪的逻辑就能够改变人民的脑子，改变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使他们忘记血淋淋的景象，并且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吗？

<sup>①</sup> 见7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话的电视转播录音。

<sup>②</sup> 见《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